

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社会的发展

学术主持 周晓虹（“长三角社会学论坛”轮值主席）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主持人语：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在这四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与此相应，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社会也发生了迅猛的朝向现代化的转型。围绕中国城乡社会的变化，与改革开放同时重生的中国社会学，尤其是最先感受改革开放之风的长三角地区的社会学人，四十年来筚路蓝缕，面向中国社会和中国现实，以自己的研究投身伟大的变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此，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今年八月成立的“长江三角洲社会学论坛”邀约本地区八所院校的教师撰文，分两辑讨论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以期引起整个社会更多的关注，并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变革。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迁

张文宏

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以经济、财富和资本为核心的多元分层标准已经取代单一的政治标准，身份制逐渐式微，职业结构高层化和白领化，新社会阶层与新社会群体开始出现，成为中间阶层和中上层的新来源，社会流动率提高，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和空间增加，说明40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着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开放了。

关键词： 社会分层结构 分层机制变迁 社会流动

DOI:10.16235/j.cnki.33-1005/c.2018.06.001

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重大调整，在社会领域的突出表现，是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与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本文将重点概括和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及机制变迁的特点和原因，并对未来发展的趋势进行预测。

一、以经济和财富为核心的多元分层标准已经取代单一的政治标准

1. 收入及其财富、资本开始取代单一的政治标准

改革开放之前以家庭出身和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政治标准逐渐被以收入、财富和资本为核心的经济标准所取代,后者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而强化。改革开放之前,家庭出身成为一个人政治身份的代码,是体现一个人政治地位的标识,所谓“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出身的无疑是社会政治地位的上层,而所谓“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家庭出身的人则被视为有政治污点的、被社会歧视的一类人。这种偏见在文革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曾经一度甚嚣尘上。^①

1978年以后,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推动下,经济收入、财富分布和收入分配的结果公平向“机会公平”或“程序公平”转化,这是社会分层机制的重大调整。无论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合同制、承包制、计件工资制、下岗分流增效、产权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制度的出台,无论是鼓励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还是建立沿海经济特区、大力引进三资企业的重大举措,都标志着经济收入、财富甚至资本成为社会分层的一个标准,通过合法劳动、投资积累个人及其家庭的财富成为多数社会成员的一个奋斗目标,也成为人们提升自己及其家庭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认为以收入、财富及资本为核心的经济标准已经取代了政治标准作为中国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准。

2. 教育以及培训经历、从业经验、职业资格证书等人力资本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性上升,成为评价社会成员地位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文革期间,以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几乎被忽视,特别是当时人力资本最丰富的知识分子被排在社会分层结构的底层,其中的许多人摆脱不了被批斗、被劳改、被下放的命运。

1978年以后,随着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恢复,教育在社会分层及社会声望评价中的重要性重新确立。198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恢复了学士、硕士、博士等系列学位制度、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制度、技术证书制度(会计师、律师、资产评估师、建筑师等),使以教育文凭和专业技术证书为核心的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在社会分层中的功能不断凸显和强化。高等学校招生人数从1977年的27万人、录取率4.8%,到1999年的159.7万、录取率为56%,再到2017年的700万、录取率74.46%,不仅说明了高等教育在提升人们的社会地位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呈现出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转型,中国正在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3. 职业成为判断社会成员相对分层位置的一个基本条件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职业是分析现代社会结构的一个基石,职业结构是社会结构的直接反映。布劳和邓肯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中的职业结构不仅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基础,支撑着社会分层的一些主要方面,而且联系着不平等的不同制度与领域……无论是由各声望阶层组成的等级秩序,还是由各经济阶级构成的等级秩序,均植根于职业结构;而由政治权力和权威构成的等级秩序也是如此。因为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全日制的职业来从事的。”^②多数社会成员能够获得怎样的收入、财富、社会声望及社会经济地位,与其所从事的职业之间直接相关。

1949—1977年,国家在就业领域实行的是充分就业和收入分配相对均等的“结果平均”的政策,因

^① 张文宏、刘琳:《市场转型与家庭成分问题研究——以“黑九类的子女们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② Blau, Peter M. and Otis Dudley Dunc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NY: John Wiley & Sons, 1967, pp. 6—7.

此造成了从事不同职业的劳动者的工资及福利待遇差别不大、政治权力相当、社会地位相近的后果,客观上压抑了人们向上流动和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后,代表不同利益的各种职业群体开始出现并趋于复杂化,附着在各种职业群体身上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急剧分化,尤其体现在第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回报差距明显。职业成为确定一个社会成员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相对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尺。

4. 以品味、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为核心的文化资本成为社会分层的另一个重要标准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基本上属于生活必需品高度短缺的计划经济体制。人们的工资收入除了满足最低的生存需要以外,几乎没有剩余用于发展、娱乐和自我实现等方面的需要。在“单位制”下,城市的居住模式是阶层混杂型的,高层和低层人员都居住在同一个单位大院中,甚至同一幢楼房中。因为当时的非市场型的住房分配模式,家庭人口、工作年限、婚姻状况是最重要的分房标准。人们的闲暇活动也是由社会成员所在的单位统一组织和安排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闲暇方式的整齐划一从根本上扼杀了人们的独立性和差异性,从不同职业阶层的从业者当中很难找到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另类。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单位制的逐渐解体和城市住房的商品化改革的推进,因房地产价格的巨大差异所形成的住房阶层区隔开始显现,住房小区的阶层化特征日趋突出。在城郊结合部,则聚居着低收入者和边缘群体;消费领域,既有专门为社会上层提供高端服务的专卖店、会员制俱乐部和封闭式场所,也有专门为低收入者和社会下层及边缘群体服务的街边小店、流动摊贩。内在于在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中的品味作为一种文化资本成为区隔社会成员分层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

5. 以资源共享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在社会分层的作用回归

经验研究表明,在改革之前的再分配时期、双轨制和转型期三个历史时期,使用社会网络的渠道实现职业流动的比例分别为57.8%、66.4%和84.9%。^①说明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是实现职业流动的一种重要机制;另外一项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较贫乏、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更可能使用社会网络资源以实现职业流动;运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向是从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流向个体、集体、外资合营、外国独资、新经济部门或无主管上级的市场化的经济实体;^②此外,社会成员的科层关联度越高,其社会资本总量越丰富,表现为社会网络规模较大、网顶较高、网差较大,与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的联系也较多。社会成员的市场关联度越高,其社会资本总量越高,社会网络优势越明显。尽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索社会资本的差异,但是阶级阶层地位和与职业相关的社会关联度,是两个不同忽视的视角。阶级阶层地位限制了人们自由地拓展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职业活动给人们提供了不同的社会机遇。阶级阶层地位优势以及工作场域中的职业交往优势,可以转换为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优势。一旦具有了社会资本优势,将会产生主客观的积极效应。^③由此说明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在改革开放之前主要作为一种获取短缺的紧俏商品的手段转化为社会流动特别是向上流动的一种机制,成为人们资源获取和资源维持的一个重要手段。

二、身份制的变迁

以社会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向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的方向变化。原有的身份制度或身份体系逐渐瓦解或衰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④:

^① 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② 张文宏:《社会网络资源在职业配置中的作用》,《社会》2006年第6期。

^③ 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④ 李强:《中国社会变迁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8-20页。

1. 户籍身份的限制开始弱化。1980年代以后,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为城市居民提供生活服务。最初是“离土不离乡”,现在是“离土又离乡”。农民中出现了“农民企业家”,百万富翁、亿万富翁。2003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条例》的废除和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的推出,将城乡居民的身份平等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到2017年,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达到2.86亿人。^①此外,那些不具有本地户籍的外来常住人口,包括具有外地非农户籍的新城市人,也正是突破了户籍身份的限制而实现了地域流动和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

2. 以单位级别和干部级别为基础的分层机制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之前,1—24级的行政级别和从国级到科级的10级单位级别是各种社会资源配置以及相应级别干部的工资福利待遇发放的主要依据。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以单位级别和干部级别为基础的“官本位制”逐渐松动,开始与市场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决定人们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相对位置。

3. 档案身份已经突破。改革开放之前,人才和劳动力难以流动的原因是中国特有的严格的档案管理制度,档案身份是人才单位所有和部门所有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后,档案身份对于体制内劳动者的束缚大大减轻。

三、职业结构高层化^②和白领化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推动着中国逐步实现现代化取向和市场化取向的“双重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经济的高度发展与制度创新,导致了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与之相应的职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绝对的职业岗位数量急剧增加,另一方面低层职业的增速缓慢,中高层职业增速加快。这两个方面的变动使得40年来的职业结构趋向高层化和白领化。这种结构性变迁,为社会成员提供了社会流动的空间。

四、新社会阶层与新社会群体开始出现,成为中间阶层和中上层的新来源

2006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2015年中共中央颁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规定,新社会阶层主要由“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组成。中央统战部2015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民营企业 and 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约4800万人,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约1400万,自由职业人员约1100万人,新媒体从业人员约1000万人。如果加上3560万私营企业主和5400万个体工商户,我国“新社会阶层”的总规模大约为1.73亿人,占当年就业人口的22.29%。从新社会阶层的职业性质、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认同等方面来判断,这部分人成为中国中间阶层和社会中上层的新来源。

五、社会流动率提高,向上流动的机会增加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先生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研究结果,1980年以前就业人员的代际总流动率为41.4%,1980年以后为54%。同时,两个时期的向上流动率分别为32.4%和40.9%,向下流动率分别为9.1%和13.1%;从初职与现职的代内流动率来看,1980年前的总流动率为35.3%,1980年后的总流动率为38.2%,两个时期的向上流动率分别为23.8%和22.6%,向下流动率分别为11.5%和15.6%;从前职与现职的代内流动率来看,1979年前的总流动率为13.3%,1980—1989年的总流动率为30.2%,1990—2001年的总流动率为54.2%,三个时期的向上流动率分

^① 国家统计局2018年4月27日发布《2017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

^②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8—137页。

别为7.4%、18.7%和30.5%，向下流动率分别为5.9%、11.5%、23.6%。^①

根据另外三项调查的结果，^②1990年总流动率为50.0%，1993年是47.3%，上海大学2012的调查显示总流动率达到66%，纵向来看中国社会更开放了。再看向上流动的比例，1990年为40.1%，1993为35.8%，上海大学的调查是47%，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的调查，向上流动的机会上升了。社会流动性比上世纪更加显著，当然代际性流动呈现出较高度度的子承父业，父亲职业对其职业获得有影响。

从社会流动率不断增长的趋势来看，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中国社会流动率增加不仅体现在向上流动方面，同时也表现在向下流动方面。工业化、城市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了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升级，这必然带来向上流动机会的增加，这也是所有工业化国家社会流动的普遍趋势。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工业化的进城伴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在体制转轨变型的过程，部分人经历了向下的社会流动，从而导致了向下流动率的上升。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以经济、财富和资本为核心的多元分层标准已经取代单一的政治标准，身份制逐渐式微，职业结构高层化和白领化，新社会阶层与新社会群体开始出现，成为中间阶层和中上层的新来源，社会流动率提高，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和空间增加，说明40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着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开放了。一定比例的代际传承现象，不足以得出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结论。当然，中国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占主导地位的橄榄型或纺锤型的现代社会分层结构，还需要继续推进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制度变革，破除所有阻碍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制度和制度屏障，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增强人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作者张文宏，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 200444〕

①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76、179页。

② 李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55页。